

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遊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李歐梵*、橋本悟**

摘要

本文試圖從十九世紀末期荷蘭的一本科幻小說 *AD 2065*（中文譯名《夢遊二十一世紀》，日文譯名《新未來記》）以及其中文和日文譯本，來比較研究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的不同反應和接受，以作為一個「跨文化」翻譯研究的案例。本文先從該書的英文譯本和楊德森的中文譯本，透過文本細讀，替原作者的科學幻想的知識性內涵進行文化史的定位，並窺測其啟蒙式的「歐洲本位」的現代性意圖。本文然後進入中日譯文的仔細比較，並將之置於兩國不同的歷史脈絡：晚清的改良運動和日本的「蘭學」傳統。最後經由日本譯者近藤真琴在譯文每一章後面的詳盡詮釋和反應——特別關於中日兩國將來在東亞對抗西方的地緣政治地位——略作現代的解讀。

關鍵詞：科學、烏托邦、進步文明、大同世界、蘭學、地緣政治

* 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 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1903 年《繡像小說》雜誌連載一篇稱為「科學小說」的中譯本：《夢遊二十一世紀》，作者筆名為「達愛斯克洛提斯」，乃 Dr. Dioscrides 的音譯，譯者是楊德森。此書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列入「說部叢書」初集第三編，十年後（1913）該書已經出了六版，可見當時頗受歡迎，然而在晚清知識分子群中似乎沒有引起太大反應，至今研究晚清的學者對此書也不大重視，僅僅將其與晚清的大量科幻小說放在一起。唯有英國學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在一篇論文中率先提到此書的價值，認為「此作並未以小說自居，實則是對二十一世紀未來世界的聯翩浮想，」而且「譯文（原文以文言文翻譯）中譯注既長且多，殊屬難能可貴。」¹ 但卜立德僅從中譯本而立論，並未仔細分析原文內容，也未找到原著和其他英、日譯本作比較。

多年前我翻閱《繡像小說》雜誌時，第一次讀到這本《夢遊二十一世紀》，為其題目所吸引，我讀後覺得這個「科幻」故事相當不俗，於是向哈佛的同事，也是著名的漢學家伊德瑪（Wilt Idema）請教。他是荷蘭人，而且早已知道這本荷文名著，根據他提供的資料，作者哈亭（Pieter Harting, 1812-1885）是荷蘭的一位科學家，對於各種科學領域，如生物、醫學、和地質學等皆甚精通。在他有生之年頗有名氣，並曾於 1873 年書寫自傳，1961 年由烏特萊特（Utrecht）大學博物館出版。他也是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信徒，在荷蘭推廣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學說，並且對於科學的普及致力甚勤。

¹ [英] 卜立德（David Pollard），〈凡爾納、科幻小說及其他〉，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19-120；英文版：David Pollard, "Jules Verne, Science Fiction and Related Matter," in David Pollard, ed.,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pp. 177-207.

哈亭於 1865 年寫了這本小說，原名是 *Anno Domini 2065: een blik in de toekomst*（《紀元後 2065：將來的一瞥》），1870 年再版時又改名為 *AD 2070*，次年由英國人 Alex V. W. Bikkers 譯成英文，名叫 *Anno Domini 2071*，《夢遊二十一世紀》就是這個英譯本的中譯，至今似乎也只有這一種中譯本。²

原著的兩個版本皆有日譯本，而且第一本早在 1868 年，即明治元年，便已譯成，直接譯自荷蘭文，日譯者近藤真琴（1831-1836）。該書書面注明印刷於明治十一年（1879），書名叫《新未來記》；而另一種日譯本則出版於 1874 年，譯者是上條信次，由英譯本翻譯為日文，名曰《後世夢物語》。³ 經過臺灣學者吳佩珍和日本學者橋本悟的協助，我終於找到了日譯本的這兩個版本和 1871 版的英譯本。這本日文譯著是明治維新後的第一本西書，而且引起整個日本朝野對於「將來學」的熱潮。⁴ 然而為什麼此書在日本朝野引起轟動，而在中國似乎默默無聞，這就有待進一步研究了。2013 年夏我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認識哈佛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橋本悟，發現我們研究的興趣和方法十分相近，也得到他的合作和啓發甚多，因此決定共寫

² 據吳佩珍教授提供的日文資料，還有一本譯自日文版的中文譯本，但至今尚未找到。楊德森在序言中說 Bikkers「又譯德文為英文」，可能不確。我的研究助手崔文東從網上找到而下載的英譯本（Duke University Library: *The Glenn Negley Collection of Utopian Literature*）封面注明譯自荷蘭原文，見：Pieter Harting, Alex V. W. Bikkers, tr., *Anno Domini 2071. 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Original, with preface and additional explanatory notes* (London: William Tegg, 1871). 以下英譯本皆據此。

³ 網上下載的日文翻譯的兩個版本，資料如下：1.《新未來記》，近藤真琴十年前譯述，明治十一年十二月版權免許，青山氏藏版。2.《開化進步後世夢物語》上條信次譯，東京奎章閣發兌，明治七年十月，山城屋政吉。感謝我的研究助手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生崔文東，為我從網上下載；臺灣政治大學的吳佩珍教授得知我的興趣後，也慷慨複印她手頭早已擁有的兩個日文版本。吳教授研究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小說多年，對此書也早有涉獵。在此特向三位年輕學者致衷心的謝忱，沒有他們的幫助我根本無法研究這個題目。

⁴ 參見網站：<http://www.sf-encyclopedia.com/entry/japanta>（檢索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

此文，本文第一部分由我負責，第二部分有關日本方面則由他執筆（他用英文，由我譯成中文）。內容和論點則是經過我們兩人在中研院文哲所的多次討論的產物，⁵ 因此本文由我們兩人聯合具名發表。

因為我們二人都不懂荷蘭文，無法研讀原著，只能先從英譯本和中譯本中略窺此書的內涵。然而英譯本的文體是拐彎抹角的維多利亞式英文，絮叨之至，實在不敢恭維。更不可取的是譯者在序言中聲明：為了顧及另一種文化語言的接受能力，不得不大刀闊斧作了刪節。到底刪了多少？刪在何處？我們雖然找到了荷文原著，但也無從仔細查證。相形之下，中譯本的文言譯文簡潔多了。

二、憧憬二十一世紀的新世界

（一）科學的烏托邦

此書特別之處，就是它的幻想部分完全根據作者個人的科學知識。他不惜引經據典，舉出歐洲中古以來的各個偉大的科學家的發明來證明，將來世界的各種發明並非自天而降，而是各代科學家的貢獻。這些古代的科學家並非有意，往往無心插柳（serendipity），而間接引發新一代的靈感；換言之，沒有原先的理論基礎，新的科學發明無由產生。這一個論點，目前早已被科學界公認。⁶

作者的另一個命題——小說一開頭就這麼說：有鑒於近世紀的巨大變化，使得文明大幅進步，將來的世界又會演變得如何？是否繼續走進步的路？顯然哈亭的達爾文主義並不悲觀，他以這本小說來證明

⁵ 在此特別要向文哲所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室的招待和協助致謝，於 2013 年春夏期間提供我們短期研究的機會和理想場所。

⁶ 參見 Umberto Eco, “Preface,” *Serendip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9).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兩百年後的世界不但更進步，而且逐漸走向世界大同之路。這一種「進步主義」的說法，也就代表了十九世紀中期——哈亭活躍的時代——的一種思潮，後來傳入日本和晚清的中國，直接影響五四時代的科學主義。所以，這本科幻小說的主題是嚴肅的，寓科學思想於小說的「幻想」模式之中，而非從娛樂角度出發，以各種曲折離奇的情節或科技發明的奇器來吸引讀者。因此，商務出版的中譯本在封面上言明屬於「科學小說」，涵義更正確。晚清翻譯小說還有一個次文類，叫作「理想小說」，此書也可以列入此類，因為它試圖提供個一個將來西方社會的藍圖，一個理想的世界。這一個傳統，可以上溯到柏拉圖，到了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名著《烏托邦》（*Utopia*, 1516）——嚴復譯作「烏托邦」——才奠定一個新的模式。後來又有培根（Francis Bacon, 1521-1626）的《新大西洋洲》（*New Atlantis*, 1526）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的《烏有鄉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891）等名著，將之發揚光大。這個模式基本上是脫離宗教的，理想國並非天國，而是人類的理性造成的美好社會，換言之，它是文藝復興以後的產物。摩爾的「烏托邦」居民都不是基督徒，《新大西洋洲》的居民表面上是基督徒，其實真正信仰的是理性哲學。⁷ 哈亭顯然繼承了這個傳統，但在小說中增加了更多的科學成分。

妙的是，哈亭的這本小說的主人翁也叫培根，但不是 Francis Bacon，而是一個更早的歷史人物 Roger Bacon（1214-1294）。⁸ 他在

⁷ 關於這兩部烏托邦名著，參見 Susan Bruce, *Three Early Modern Utopias: Thomas More: Utopia / Francis Bacon: New Atlantis / Henry Neville: The Isle of Pi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關於烏托邦的觀念如何傳入中土的「觀念旅行」，參見顏健富，〈小說烏托邦——論晚清文學的結構與書寫〉，《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17-151。

⁸ 這位中古的科學家的地位，似乎在十九世紀更受尊重，咸認為是歐洲最早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拉伯傳統得到靈感，發明實證科學方法的人。二十世紀的學者的意見不同，只認為他是一位中古學者。參見「wikipedia」網站的「Roger Bacon」條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Bacon（檢索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哈亭雖然借用他的名字和身分，但

書中以鬼魂的面目出現，中譯本文中有如下介紹：「夫培根者，十三世紀之人物也，沉靜深思，精於格物學，然生非其時，命途多舛，為群小所嫉，誣為巫蠱，下獄讞定，禁錮十載，鬱鬱不得志，斃於獄中，亦慘矣哉。」作者又說：「嘗讀其傳而思其卓論，其意想所及，懸揣於五六世紀以前，而於今適為吻合，一若先知也。」⁹ 培根臆想到的發明，一一系列，如可望星辰的望遠鏡、「人將製不持人畜之力而能行動之車，其行且必較人畜為迅速，人將製不持人畜之力而能行動之舟，艨艟巨艦，一人駕之而有餘，其駛行更速」、「建築橋梁，可舍柱而成」等等。作者以培根為先知，恰是因為他當年根據科學和理性推論而想像出來的東西，現今已成事實。然而，哈亭在十九世紀中葉（1865 或 1870）所見到的、和小說中所想像的二十一世紀（2065 或 2070）的世界，還是有差別的。哈亭自己也在扮演一個培根的角色，把他有生之年看到的科學發明——如蒸汽機、電報、汽艇、火車、地洞、吊橋、攝影、瓦斯、望遠鏡及顯微鏡、潛水鏡、航空儀器等——作進一步的推論和幻想，而不是無中生有、胡思亂想。因此，我們也可以把書中的二十一世紀理想世界和當今（2014）的所見所聞相比較，不難發現不少驚人的遙相呼應之處。有些幻想物如今也成了二十一世紀的現實，例如：鋁的廣泛採用、中樞控制的冷氣和暖氣機、以太陽能調節的玻璃溫室、越洋無線電和收音機、橫跨英倫海峽的地道火車（書中是長橋）、以北京為起點的通往歐洲的西伯利亞鐵道、設在中亞的大型天文臺和望遠鏡、甚至於登陸月球（書中的敘述者存疑）……。唯獨書中的飛行工具仍然是氣球，而非噴射機，更沒有如今普遍採用的電腦和網路。

小說所描繪的理想世界似乎更近 Francis Bacon 的 *New Atlantis*，因為二者皆注重科學和政治的關係。

⁹ 〔荷〕達愛斯克洛提斯（Dr. Dioscrides）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年），頁 2。以下引文皆據此版本。

以上所列的各種發明，書中皆以培根的鬼魂和他的俏佳人伴侶 Phantasia 小姐（中譯本作「芳德西女史」），一一向愚昧無知的十九世紀敘述者「我」詳加介紹，並解釋原理，煞費周章。培根是一個智者，說話有條有理，又有耐性，而年輕的芳德西女史則時而衝動，時而嘲笑。二人剛好互相搭檔。

敘述者的身分顯然由作者衍變而來，他在開頭時因緬懷先哲，特別是培根，「輾轉凝思，漸入幻想」，發現自己身在一大城中——倫敦呢阿（Londonia），不識其地，「遙見鐘樓聳起於前，往就之，見其題語曰：紀元後二千七十一年元旦」。¹⁰ 這一個開頭，令人想起另一本晚清流行甚廣的科幻小說《回頭看》，又名《百年一覺》，原名是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作者是美國人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經由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最先於 1891-1892 年間在《萬國公報》譯介連載，立刻轟動朝野，名人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看過，影響深遠。¹¹ 然而，這本美國小說寫於 1888 年，在 AD 2065 之後，晚了二十多年，是否反而受到這本荷蘭小說的影響？至今我尚未查到有關這兩本小說的比較研究的論文。

（二）穿越時空的旅行

哈亭和所繼承的這個科學小說的傳統，內容至少包括三種成分：一、想像的科技；二、穿越時空的旅行；三、故事內涵有一套哲學或社會理論。¹² 此書三者兼具，第一項已見前述，但第二和第三項尤見

¹⁰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3。

¹¹ 張治，《中西因緣：近現代文學視野中的西方「經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 年），頁 3-6。

¹² Adam Roberts,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突出。

故事一開始就介紹「二十一世紀」的新時間觀念，可見作者的烏托邦世界必須從一個新的時間觀念開始締造，換言之，沒有新的時間觀念，就無法想像這個新的世界。故事開始的時空點很明顯：敘事者夢遊到 2065 年（英文版 2071 年）元旦，地點是擴大後的倫敦，佔了英國東南部，人口增多至 1200 萬。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超級大都會」（megapolis），已不足為奇。更重要的是書中標誌的時間。敘述者看到巨鐘的「鐘面之長短鍼不一，目為之眩」。¹³ 原來鐘面至少有三種時間指標：「真時」（True Time），即當地現在的時刻，「中時」（Mean Time），指的是一種標準時間；這個時間直到 1884 年才由歐美各國討論，後來公認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為標準，故距離哈亭此書成書時間至少晚了二十年。¹⁴ 但最新奇的是書中所提到的 Aleutic Time，中文直譯為「阿魯底時」，究係何解？後兩種時間，顯然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還是陌生的，所以譯者關於「中時」觀念，還特別加上一條很長的註解。¹⁵ 而「阿魯底時」指的是什麼？英譯本和中譯本皆在文本中詳加解釋，原來海底電線鋪設後，「自周球電線四繞，交通日便，各地時刻不能合一，不得不設一新時刻以求劃一……既便於商務，又利於全球人民，是以萬國公議，以阿魯底島（中譯本在此又加上一條註）為地球之中點，當島中

2005).

¹³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4。

¹⁴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35. 各國雖然在華盛頓開會，但承認和接受時間不同，日本最早（1888），接著是荷蘭與比利時（1892），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1899）；法國依然很亂，中國先有電報，但採用的是上海洋人的時間。直到 1913 年 7 月 1 日愛飛爾鐵塔第一次發出時間訊號後，世界各國才逐漸採用統一時間。同前註，頁 12-14。

¹⁵ 同前註，頁 4。

日出時，為大同時刻，計各地時刻之差而損益之，庶無參差之患」。¹⁶有了這一個世界公用的「大同時刻」，一個嶄新的「美麗新世界」於焉開始，英文版的譯文是：“then begins the world-day”——「世界日就此開始」。然而中文譯本卻用「大同時刻」一詞，來自何處？哈亭小說所描寫的將來世界依然是多個國家所組成，但他提倡非戰，息兵，永遠解決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殺戮。解決的方法就是「萬國公議」和商務的流通，類似今日的聯合國和「全球化」。然而「大同」一詞典出《禮運·大同篇》，令我們想到康有為的《大同書》，然而此時（1903）譯者楊德森不可能讀到康有為的《大同書》，文本中顯示的世界大同的想法是否反而影響到康有為的最初構思？抑或是二人「英雄所見略同」？都從《禮運·大同篇》得到靈感？我們無法判定。但重要的是：然而，哈亭畢竟不是一個小說家，他沒有建構一個完整的烏托邦藍圖，只不過突出了他個人的政治觀點：非戰和自由貿易，似乎更接近十九世紀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內中的社會主義色彩並不濃厚，但對於如何保存文化遺產的問題卻很著力描繪，例如倫敦呢阿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見下文）。這是否和譯者的興趣不謀而合？他為什麼要翻譯這本憧憬未來的烏托邦小說？

根據能找到的有限資料，譯者楊德森是江蘇吳縣人，1899 年入讀上海南洋公學，曾在同學組成的群智會班上講解嚴復譯的《原富》，未幾捲入學潮而退學，1904 年 5 月赴比利時蒙斯大學（University of Mons）學習鐵路專業，後轉入安特衛普大學（University of Antwerp）攻讀銀行學，得商學學士學位，1910 年已經回國。照時間推算，《夢遊二十一世紀》應是楊在南洋公學讀書時翻譯的作品。該校的外語課程是英文，所以根據英文譯本翻譯的。¹⁷ 他顯然不懂日文，序文中隻

¹⁶ 同前註，頁 5。

¹⁷ 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名人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 年），頁 348。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撰委員會，《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896-2005）》（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字未提日文譯本；而且他和梁啟超的日文翻譯方式不同，比較嚴緊，雖然註釋詳細，但毫不作個人論述。這本小說可能也是他唯一的譯作。

梁啟超恰在三年前（1899）第一次提出中國必須採用西曆，¹⁸ 務期與世界大多數國家接軌；換言之，就是把「中朝」變成一個現代國家而進入多個國家（英文俗稱“family of nations”）的世界體系，用意頗類似《夢遊二十一世紀》中的看法。那麼，為什麼梁不翻譯此書，卻在《新小說》創刊號（1902）譯載了法國天文學家兼小說家佛林馬利安（Camille Flammarion, 1842-1925）於1894年寫的「反烏托邦」小說《世界末日記》（*La Fin du Monde*）？為什麼梁氏獨鍾這本《世界末日記》？這是一個至今未能解釋的謎。因此這兩個文本的「互文」意義就值得進一步探討了。

楊德森也許沒有看過《世界末日記》，但不可能不熟悉梁啟超的作品，我們甚至可以說，晚清文學思想對於「現代性」的理解，當然和大量翻譯引進的十九世紀西方思潮分不開，內容龐雜，並不一致。一方面，西方現代性中的進步觀念本身就是基於時間直線前進——而非輪迴——的假設，科學的發明更助長了這種時間觀念，並以此為基礎締造將來的烏托邦想像。然而十九世紀末葉的歐洲思想家、科學家和文學家並非人人皆是「進步主義」的信徒，佛林馬利安就是一個例子，他與哈亭所揭櫫的太陽能有無限潛力的觀點恰好相反，認為地球終有「熱寂」的一天。¹⁹ 對於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種悲觀論調是否會被接受？在《世界末日記》的中譯本中把將來移到西曆220萬年，遙遠不可及，反而《夢遊二十一世紀》中的將來是一百多年後，

年），卷上，頁17、45。以上資料乃我的研究助手崔文東搜得，特此感謝。

¹⁸ 〔清〕梁啟超，〈夏威夷游記〉（舊題〈汗漫錄〉又名〈半九十錄〉），收入《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冊2，頁1217-1222。

¹⁹ 梁啟超，《世界末日記》，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冊11，頁1-10。

比較具體。但即使如此，這一種進步的時間觀念還是與中國傳統不合。所以楊德森在序文開頭就開宗明義地說：「孔子曰，百世可知，言大經大法，萬變不離其宗也，若夫滄海桑田，遷移何定，今日繁盛者，安保他日之不衰息？」字裡行間依然隱含一種由盛而衰的輪迴時間觀念，對於「百世以後」的將來無法肯定，所以又說：「然則查已往，觀今世，以逆料將來，豈可知之數耶？不可知之數耶？」語意不定；雖然古今「無可知之事」，但「有可知之理，據所已知以測所未知，初非托諸虛誕耶」，²⁰ 這才是他翻譯這本小說的理由。

楊氏把孔子（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百世觀和西方的世紀觀放在同一文本，頗資玩味。所謂「百世」並非指一百個世紀，而是泛指很長的時間，但西方的現代性時間算法比較精確：AD 2065（或 AD 2071）剛好是原書寫完兩百年。上面提到的另一本極有影響的《回頭看》，英文原著的時間範疇也極精確，即從公元 2000 年回望公元 1887 年。這一套可以確定而不虛幻飄渺的將來時間，非但界定此二書作為「科學小說」或「理想小說」的時間界限，而且更具體地支撐「進步觀」的烏托邦造型。然而同時期出現的大量科幻小說，內中的時間觀念都很模糊，出自晚清文人一廂情願的模仿或創造，卻往往流於「虛誕」。就《夢遊二十一世紀》的譯者而言，這本書之值得翻譯和借鑒，也在於此：「據所已知，已測未知」，把十九世紀的「現在」讓科學的推測投射到二十一世紀。

然而，原作者只不過借「夢遊」的框架來展示他對將來進步文明的藍圖。這本小說中敘述者的經歷的時間只有兩天！既然只有兩天，則必須把小說世界中的空間拉大；換言之，就是作一種小說式的「時空壓縮」，敘事者必須以極快的速度旅行世界各地，也必須搭乘新科技發明的旅行工具——氣球。作者不厭其煩地把氣球如何利用空氣和

²⁰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序》，《說部叢書》，頁 1。

風力的道理以及用電磁發動的「轉運力管旋轉」和升降的科學原理，仔細解釋。重點反而轉移到氣球上去了。從我們現在——已經真的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知識視角看來，似乎有點可笑，氣球的速度如蝸牛，早已落伍。其實對晚清的讀者而言，氣球已經不是太過新鮮的事物。陳平原曾在一篇長文中仔細討論晚清報刊——特別是《點石齋畫報》——關於氣球的報導。²¹ 此處不必細述。其實歐洲早在十八世紀末就發明氣球，1782 年第一次升空三十米，並在巴黎舉行氣球展；1874 年第一次由巴黎飛到里昂，剛好和哈亭作此書的時間差不多。只不過小說中的氣球可以環遊世界。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環遊地球八十天》寫於 1873 年，較哈亭的書稍晚，1880 年就有日譯本，但中譯本遲至 1900 年才出現。說不定《夢遊二十一世紀》也剛好趁著晚清報刊流行的「氣球熱」而出版。凡爾納作品在歐洲也甚流行，他的《地底旅行》和《從地球到日球》分別出版於 1864 和 1865 年，又和 *Anno Domini 2065* 的寫作時間相仿。至於二人對彼此的作品是否知曉，以及作品之間的互文關係，只好有待其他學者研究了。²²

雖然《夢遊二十一世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氣球，但全部遊程毫無探險意義，所以又和《環遊世界八十天》不同，而是藉由旅遊帶出一個新世界的構思和理念，這才是作者寫此書的目的。在作者心目中，這個理念的基礎就是「進步的文明」。哈亭勾畫出來的文明世界，顯然是以城市為中心——倫敦呢阿，妙的是這個荷蘭作家用一個英國人和英國城市作主角，而不用荷蘭為藍本，顯然承認大英帝國在當時

²¹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頁 247-275。

²² 關於凡爾納小說的中譯，可參見卜立德，〈凡爾納、科幻小說及其他〉。他的作品在日本也極受歡迎。日本譯者對於《地底旅行》的反應和處理，也和本書相似，有待繼續作比較研究。

的主宰地位。從後殖民理論立場而言，他的這套論述還是脫離不了「歐洲中心」的心態，和《環遊世界八十天》一樣，以倫敦為中心（Metropole）出發到世界「邊緣」，旅遊本身就帶有殖民的象徵意義。更明顯的是故事最終，氣球要降落澳洲，作者直接帶出來荷蘭在爪哇的殖民地問題，作者顯然同情較開明的一派，要教育爪哇人，助其將來獨立。到了小說最後，氣球降落在目的地新西蘭，卻成了「新荷蘭十二郡聯合共和國」的地方，文中似乎把澳洲的墨爾本也算在其內，原來這塊英國屬地已經獨立自治，和英國正式地分家了。哈亭提出這個「後殖民」的理想國——「The Twelve United States of New Holland」，故意以此來代替荷蘭的殖民地（爪哇）現狀，表面上十分開明，但骨子裡依然是殖民主義者的立場。這一個潛在的殖民主義傾向，反而被日本譯者近藤真琴一語道破。（見後文）

（三）新世界的進步文明

倫敦呢阿既然是新世界的中心，它的進步文明，書中以三大館為代表：一是“Heliocromes Exhibition”——中譯本直譯為「希利亞克洛姆斯賽會場」，“Exhibition”譯為「賽會場」不能說是錯誤，可能晚清的詞彙中尚無博覽會或展覽會字樣，至少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還是陌生的。但在 19 世紀的西方，“Exhibition”早已成了炫示各國物質文明進步的展示場，整個十九世紀西方各國舉辦的博覽會層出不窮，最有名的是 1851 年為紀念英女皇維多利亞登基的一場盛大的博覽會，俗稱「水晶宮展覽」（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乃轟動一時的盛事，它展示的基本科技就是玻璃。1889 年巴黎的另一場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也因為此而建的愛菲爾鐵塔永垂不朽，展示的基本科技則是鋼鐵。本書作者更進一步，把科技材料推展到鋁和攝影，這個 Heliocromes 展覽館以一種最先進的彩色照相技術，取代了

舊時的美術館。原文中已經提到幾個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研究照相的科學家，但在培根眼中都不夠先進，小說中的敘述者進去參觀，只見五光十色、各種尺寸的大小照片，直看得眼花撩亂。作者以對話的方式點出繪畫的藝術品與照相的不同：藝術並非只為了模擬現實，而是要把現實「理想化」，館中展覽的名畫家是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科雷吉歐（Antonio Correggio, 1489-1543）、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和林布蘭（Rembrandt, 1606-1669），前二人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巨匠，後兩人則是荷蘭大師。可能這些名字皆是初次在晚清文壇出現。原作者哈亭並沒有將照相取代所有的藝術品，而只是把那些無以計數的模擬大師的作品，以照相方式保存，不留原件，以照相代之足夠。²³ 照相技術在二十世紀初已經介紹進入中國，慈禧太后第一次照相的時間僅較這本小說中譯本初度連載時晚了幾年而已。這也許是偶合，說不定這本小說也作了間接的「推廣」，功不可抹滅。

小說中第二個「進步文明」的代表是「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中譯本譯為「萬國藏書室」，似乎認為如此龐大的藏書室一定包羅萬有，因此叫「萬國」。這個圖書館面積極大，「廣廈林立，密若村市」。英譯本稱之為“bibliopolis”——書城，又形容它是“labyrinth of learning”——學術的迷宮，意象預示了阿根廷小說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對於圖書館的描寫。妙的是波氏的靈感反而來自中國的「四庫全書」。中譯者楊德森沒有註明這個關係，但卻漏譯了圖書館各幢樓中間的大廣場，內有各種公園、花園和街道，到處展示雕塑藝術品，可見原作者對它的重視。換言之，在哈亭的二十一世紀文明藍圖中，藝術和科學並重，二者缺一不可。因為他

²³ 這一套理論似乎預示了半個世紀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有關照相和電影的「複製」技術對於藝術品的「靈光」的影響的理論，當然哈亭的理論較班雅明淺薄得多。

是科學家，所以小說的敘述者也選擇去參觀生物館中的飛蟲（entomology）館。作者不厭其詳的分類，從「格致」（natural science）到生物（zoology）到飛蟲，最後進入一間大廳，四面牆壁從上到下擺滿了書，原來是飛蟲中的一小類——「雙翼飛蟲學」的藏書室！哈亭心目中的分類法似乎來自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他對將來世界文明的信心顯然也基於啟蒙運動對於人類理性的極度尊重。除此之外，哈亭的進步主義也和英國十九世紀的幾位自由主義思想家——特別是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掛勾。他在這本小說中特別提出強迫教育的重要性：二十一世紀的人個個都識字，因為有政府強制執行的教育。文明和「無知」是對立的，而教育則是剷除無知的必須手段。這一個結論，我們現今看來天經地義，不必辯解，但在哈亭的時代仍然有人認為這是侵犯了家長教育自己子女的自由，特別在英國，所以此書的英譯者 Bickers 特別加上一個註解，極力讚揚哈亭的主張。²⁴

第三個進步文明是「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楊德森將之譯為「萬國博覽院」。這個「博覽院」好像最能引起敘述者的興趣，他「不禁喜躍曰，嘗聞游歷他邦者，必入博覽院以饜眼界，今願附驥尾，略擴聞見。」²⁵ 哈亭則利用這個博物館的形式來抒發他的達爾文主義。小說中芳德西故意把敘述者帶進其中的“Genealogical Museum”，楊譯為「譜系學考察室」，這位女史說是她的個人嗜好，原來譜系指的不是族譜和文物，而是各種「動物骸骨、羅列無算，有馬骨、象骸、犀骨……古時奇獸、及不知名動物之巨獸」，顯然就是當今西方各「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陳列的考古東西，但在十九世紀的語境，都是達爾文主義的隱喻。顯然英譯者精

²⁴ Dr. Alex V W. Bickers, *Anno Domini 2071*, p. 42.

²⁵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21。

通此理，特別加上一條註解，提到當時的辯論：到底人類的祖先是否也從這些遠古巨獸進化而來？芳德西和培根的意見有所分歧，前者認為物種進化的理所當然，人類亦是如此，於是要引導敘述者到內室去觀察人類祖先的骸骨，卻為後者所阻止，顯然培根不承認。英文譯者在此批註，認為即使大哲如培根，也有失誤之處，²⁶ 因為他認為人類不在達爾文的「物競生存」的進化範圍之內。這到底是否作者哈亭的看法？中譯者楊德森又作何見解？譯文並沒有為此作特別註解。

敘述者在一天之內在倫敦呢阿遊覽了「進步文明」的三大座標——照相展覽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之後，就回到旅館休息。至此小說情節告一段落，然而只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小說的中間部分則是用來作各種議論和科學原理解釋。最後一部分才是乘氣球遊覽世界，但情節毫無驚險可言。哈亭的小說和凡爾納膾炙人口的《環遊世界八十天》大不相同，沒有英國紳士為爭取時間和速度——一個典型的現代性主題——而打賭，更沒有到各地冒險的經歷，最後也沒有回到倫敦，氣球在「新大陸」紐西蘭降落，小說未及介紹這個「新荷蘭共和國」就突然結束，氣球落地，敘述者才發現自己作了一個美夢。

所以嚴格說來，這本小說其實不能算是小說，因為它缺乏敘事的進展，也沒有高潮，倒是和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利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²⁷ 略有相似之處，卻沒有轉化成小說所隱含的諷刺，正面說教的意圖十分明顯，想借「將來」而諭今——也就是作者所處的十九世紀歐洲社會。就小說敘述學的角度而言，情節推展頗為勉強，也沒有什麼高潮，全書最重要的形式反而是「問答」話語——敘述者發問，培根作答，以將來的開明來反證現今的無知，這種

²⁶ Dr. Alex V. W. Bikkers, *Anno Domini 2071*, pp. 45-46.

²⁷ 這本名著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諷刺，單德興博士在最近出版的譯書《格利佛遊記（學術譯注版）》（*Gulliver's Travels*）（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論之甚詳。此書最早的譯本也和《夢遊二十一世紀》同時在《繡像小說》雜誌連載。

方式，類似基督教的「教義問答」(catechism)。甚至在氣球的旅程（由倫敦飛越歐陸到土耳其，又南向飛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中還不停地辯論各種思想和政策問題。這些問題，如今看來，有的是和作者個人背景——荷蘭——有關的局部問題，與晚清當時的情況不合，引不起中國讀者的共鳴（日本的反應則大不相同，見後文），然而有的觀點極有創見，甚至預見了當今全球化的世界局勢，值得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反思。

氣球由英倫出發，到了荷蘭上空，卻見荷蘭北部完全沉沒海中，敘事者大為驚異，於是引出一大堆當地治水的問題。然後又討論的一陣荷蘭的大學教育和考試制度，是由政府主持聯考或是各大學自由招生考試？這個瑣碎的荷蘭本土問題，對晚清讀者而言，似乎無甚意義，因為新的大學制度到民國時期才奠定。然而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制度，即將廢除（1905），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麼？作者由此又談到全民選舉（universal suffrage）的問題，應由幾歲開始可以投票，以及婦女的權力（在此芳德西反而反對、批評彌爾的看法）等等，這些都是當時討論的大問題，然而對於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國是否有參考價值？表面看來似乎遙不相及，然而仍有啓迪的意義。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教育問題已經開始討論，「天足」運動如火如荼，現在所謂的「公民意識」雖然尚未成型，但清廷在皇朝最後幾年不得不下詔變法，初步的議會政治正在醞釀……。從歷史回顧，這本短短的科學小說其實已經預示了不少可能性。當年的有識之士如果看過這本小說又作何想？我們無由得知。至少，《夢遊二十一世紀》提到的局限於英國和荷蘭的問題和辯論，皆非作者幻想出來的，而有相當的寫實性，是否可以作為清廷變法新政的參考？這些臆測皆是徒然，顯然中土的讀者最多只把它當作小說看，而沒有窺出它背後的政治思想。

(四) 歐洲中心式的「大同世界」

到了小說的後半部，作者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它用「科幻」的模式，真正要表達的是它對於政治和社會的理念，否則它不會讓氣球升空後的旅程變成了一個討論會（symposium），由培根和芳德西主講，藉此描繪出哈亭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他所想像的進步文明的二十一世紀，其實已經是一個「大同世界」，非但人人識字，而且各國人民在互相通商旅遊時，已經發展出一套旅行用的世界語（travelling dialect），中譯為「旅行方言」，乃「各國參合而成者，而偏重於英，蓋習英語者日多，英人之游行又日廣也」，²⁸ 以之和今（二十一世紀初）比較，這個預言相當確切。作者之作此預言，顯然以十九世紀英國的強大帝國國力為出發點，荷蘭已成小國，國威已無法和英國相比。另一方面，在小說中有一大段討論「非戰」（no more war）²⁹ 和自由貿易³⁰ 的問題，作者借芳德西之口說，在這個二十一世紀中期的新世界，只有「製造家、工藝家、貿易家、又有學士與法律家，無所謂武夫矣……今日所有之武士，君不見警察吏耶，若兵卒汰除久矣。」³¹ 哈亭的這一個構想，雖有前人創議（他舉出英國的 Cobden 和 Bright），但他認為人的本性並不高尚：「蓋人種雖為至靈，而其性質半係天人、半係禽獸，故卒不免有忿心」，³²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達爾文主義者的看法。所以哈亭預測：各國達成「弭兵」（disarmament）的協議，並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人性進步使然，而是戰爭的耗費太大，到了二十世紀末，「各國歲糜軍餉千百萬，積國債不能償，深恐無以

²⁸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33。

²⁹ Dr. Alex V W. Bikkers, *Anno Domini 2071*, pp. 69-72.

³⁰ Dr. Alex V W. Bikkers, *Anno Domini 2071*, pp. 73-76.

³¹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32。

³² 同前註，頁 34。

自立，遂成斯會，注全力於商務藝術，不若往者之專注於軍械戰爭矣」，何況「數十年前，英法美俄之戰，四國所有軍艦，同時毀滅」，水師既滅，英法二國「各於海峽之濱，以巨礮轟擊，英法二都同時焚毀，所失以萬萬計，人民死亡者，不止乎萬，各國翻然自誤，即能戰勝，所得亦不償所失，乃議設弭兵會，禁止戰爭……既無戰爭，則無所謂疆域，昔之所謂藩籬者，今出入若庭戶矣。」³³

這一段中譯十分流暢有力，與英譯本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也是原作者的核心觀點。一個十九世紀的科學家，竟然可以料想到科技用於軍事的災害（但沒有想到原子彈），至為可貴。哈亭也準確料到他逝世後英法美俄四國的勢力消長：十九世紀末英法兩國在海外果然角力，俄國勢力也擴展到中亞和遠東，直到 1904 年被日本擊敗，勢力才稍收斂，而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一改自掃門前雪的「門羅主義」，把勢力發展到太平洋，佔領菲律賓。這一切世界局勢的變遷，哈亭似乎都料到了。他雖沒有料到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但二次戰後成立的聯合國，也可以說是他想像中的「弭兵會」的初步實現。然而各強國之間的軍備競賽至今未休止。小說中培根提到因軍備消耗而引起的「全球各國經濟大破產」（universal state-bankruptcy），在二十世紀也應驗了，例如 1930 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depression）和 2008 年的金融風暴。那麼，今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象是否也應驗了哈亭所主張的以自由貿易而導致世界大同的理想？

哈亭的自由貿易邏輯很簡單：自由貿易可以使各國人民自由交流，放棄敵對，國與國之間的藩籬因而解除，取而代之的是全球通用的幣制和度量衡制度，「交通既便，器用日精，昔各國專有之利益，今成為萬國共有之利益矣」。³⁴ 中文譯者楊德森把英文版的 “weal”

³³ 同前註，頁 34-35。

³⁴ 同前註，頁 35。

（福祉）譯成「利益」，似乎稍微曲解了作者的原意，也迴避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自由貿易是否必然導致世界大同？是否就能促進全球的福祉？照目前「全球化」的情勢來看，哈亭未免太樂觀，楊德森也未必同意：他在註中特別闡明各國爭權謀利和自由通商的不同，「以前各國不求聯合，各擅其長，而專主其利，至是各國聯合而專注意於商務」，似乎在為哈亭的「通商主義」說項，言下之意卻暗示了晚清朝野追求中國「富強」的話語，他顯然深嗜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所以把“wealth”和“weal”混為一談。

哈亭以自由貿易為手段的世界大同理想，很明顯地源自十八世紀德國的啟蒙主義，小說中培根的一句話被中譯者完全忽略了，即「如果十九世紀見證了民族主義的原則，我們的世紀更進一步，發明了humanism的原則」，³⁵ 荷蘭文原著用的是“humaniteit”，應與德文的“humanität”相近，直譯就是「人類」（humanity）。英文譯者 Bikkers 為此特別下了一個註解，認為德文此字出自“Lessing”，並說一個德國名詞沒有適當的英譯並不表示在英國就沒有這個觀念，³⁶ 卻不解釋“humanism”，在英文語境的複雜意涵；日文第一個譯本用「人倫の学」一字，而中文譯者卻支吾其詞，只說「然前此不免猜忌，今乃共和，此不可比擬者也」，³⁷ 於是“humanism”的世界政體又成了「共和」了，顯然中譯者並不看重這一個基本的概念。原作者試圖從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建立一個理想的「人類共同體」，與「共和」或「大同」還差一段距離。

這一連串的「名詞旅行」引出來的是一個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的關係問題。德國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³⁵ Dr. Alex V W. Bikkers, *Anno Domini 2071*, pp. 72-73.

³⁶ Dr. Alex V W. Bikkers, *Anno Domini 2071*, p. 73.

³⁷ 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35。

哲人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就提出基於共同人性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觀念，哈亭可能也服膺此說，認為人類交往不應受制於國家藩籬，而以人類的共同人性為依歸。然而此說的背後仍然是一種廣義的「歐洲中心主義」，如從後殖民理論的觀點，它還是為歐洲的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撐腰，或作一套「啟蒙主義」式的辯解。如果將之放在十九世紀中期和末期的中日文化語境，涵義又有所改變。這就牽涉到一個更大的「文本旅行」和「接受理論」的問題了。因此，我們必須比較一下這一個荷蘭文本在中國和日本的不同反應。

三、日本的反應和詮釋：近藤真琴的亞洲詮釋

此一時期的日本，明治維新剛開始，雖然大量吸收西學，但對於日本在世界和亞洲的地位，也特別自覺，所以此書的第一位譯者近藤真琴的身世和背景也特別值得重視。他在日本的地位和名氣，遠遠超過晚清時代的中文譯者楊德森。

近藤真琴（1831-1886）的家族，在幕府時代乃屬於「鳥羽藩」（今三重縣）的封建貴族。後世公認他是「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他畢生致力與德川後期和明治初期的現代教育制度化的工作。和其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近藤接受的是日本傳統的「漢學」訓練，而由於受到 1853 年西方「黑船」打開日本閉鎖政策而引起的巨大社會和政治的變遷的影響，他就開始專攻「蘭學」。學習荷蘭文使得近藤接觸到現代知識，當時是為了實用，特別是造船技術和海軍，這就是日本進入世界舞臺的基礎。近藤從荷蘭文和英文翻譯了幾本關於航海和海軍砲術以及其他科目的教科書，自己同時有學習物理和數學等基本科學，後來在明治維新時大力提倡基本科學教育，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1855 年他被政府任命為「鳥羽藩蘭學方」的首任官方學者。1863 年他開始在幕府麾下的「軍艦操練所」教授荷蘭文和測量學，同年他開辦了一個蘭學私立學校，後來變成全國知名的「攻玉社」，在明治初年與福澤諭吉的慶應義塾齊名。明治維新後，近藤繼續在「軍艦航海訓練學校」，後被改名為「海軍操練所」執教，這所學堂是後來日本發展帝國海軍的主要機構。除了訓練海軍外，近藤也於 1875 年建立了日本第一所商業航海學校，並在「攻玉社」全心致力於普通教育，特重數學，並利用該校的資源翻譯了好幾本數學教科書。近藤雖懂荷文，但也參與「國字國語」運動並促進使用日本字母（平假名和片假名）代替漢文。1885 年近藤編撰了第一本日文字典，名叫《ことばのその》。1885 年死於霍亂瘟疫。³⁸

總而言之，這位譯者絕非等閒之輩。他以「癡道人」為筆名翻譯出來的這本《新未來記》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反響，因為他在書後詳加評論，把這本科學小說視為「警世」的嚴肅作品，希望日本讀者不要把此書作「稗史小說」看，應該有所警惕。近藤特別指出西人對於亞細亞諸國的不了解，因為不了解亞洲各國的過去和現在，所以無法預測未來。他又說：歐洲各國在三百年前就已經開始「開明」，為何亞洲各國起步甚晚？他的理由是閉關自守，長年不相往來，特別是中國，並非人種問題，而是由於中國古代文明發達，照映鄰邦，因而逐漸變得自大自尊，他邦隔絕。日本四面臨海，所以他邦很難進侵，但如今航海發達，雖千里之遙，猶如近鄰，所以譯者說：當今的日本是亞洲的英國，雖然土地較英國更肥沃；而中國則像法國，只兩面臨海，但地大如俄國，禮文之盛如意大利。亞洲其他小國如高麗、越南、泰國或緬甸就微不足道了。日本強大後，這些小國必會畏懼，而日本如

³⁸ 關於近藤的生涯，參考〔日〕攻玉社學園編，《近藤真琴伝》（三重：三重県郷土資料刊行會，1987 年）。

看到中國文明開化，當然也會坐寢不安，所以將來這兩大國必會互相競爭，如其他小國也開始開化，則其命運也不會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

日譯者的這一套地緣政治和比較文化的論說，剛好也和哈亭一樣未卜先知，極準確地判斷中日兩國將來必將競爭。果然不錯，此書譯著出版後不到三十年，中日二國就第一次開戰，日本海軍大勝，晚清朝野上下才突然從自大的睡夢中覺醒。楊德森的中文譯文出現在馬關條約簽定（1896）僅六年之後，然而他作為譯者和近藤相反，態度低調，全書雖有多條置於文本中的註解，猶如中國古書的注疏模式，而且往往不厭其詳，但譯者本人並沒有發表任何議論。是否譯者楊德森（當時還是南洋公學的學生）僅把它當作獲得西方「新知」的課外讀物而已，而沒有把它作更嚴肅的詮釋？近藤則使得其反，一方面從一個本國的地緣政治的角度延伸出更深一層的意義，另一方面，為了普及的目的，特別把這本他視為嚴肅的西學著作，作稗史小說式的通俗化處理，把原書分成七回，每回前有兩句點題的詩，後有評點，並加強文中的對話，因此擴展了小說的通俗性。楊德森反而像一個學者或知識分子，態度嚴肅，詳加註解，原文中提到譯文儘量尊重原著（殊不知英文譯文並非一流），沒有大錯，³⁹ 當然也沒有改寫。他在序文末謙虛地說：「僕之譯此，悉本英文，深慮不能達其旨，而為識者譏，世之君子，起而正之，則幸甚焉。」一套客氣話，加上內容的過度說教，反而令這本書的通俗性減低了？抑或是《繡像小說》的編者李伯元並沒有看出來這本書的科學烏托邦意義，只把它作為一般科幻小說看待而不特別重視？這一連串有關跨文化的接受的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³⁹ 楊德森的註解也會出小錯，譬如把 Mozart 譯成墨柴斯，注為「德樂書編纂家，生於十六世紀時」，把他作的歌劇 Don Giovanni 譯為「唐棋亞範」，注為「義之博古者，生於十六世紀時」。顯然缺乏西洋歌劇的知識。又把鹿特丹觀眾看的戲劇 *The Trojan Horse* 加注十四行之多。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頁 27、40。

中日兩國譯者的絕頂不同的態度，顯然和兩國譯本產生的歷史環境有關。日文譯文和中文譯本的語境不盡相同，它不僅屬於文學作品，而且橫跨數個互動的領域，導致十九世紀日本在觀念上的劇變。

首先要指出的是：哈亭的小說只不過是十九世紀中葉由荷蘭傳到日本的多種科技資料之一。⁴⁰ 譯者近藤真琴自稱先從肥田浜五郎（1830-1889）處獲得到此本原著，後者早在 1866 年寫的序文中說，他是在荷蘭遊學一年後帶回國的。二人是江戶軍艦操練所的同事。肥田曾師從著名的「蘭學」學者伊東玄朴（1800-1871）學習荷蘭語；伊東則是荷蘭學者菲利普·法蘭茲·馮·西博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在長崎設立的私立學校的學生，專攻醫學。日本自從 1853 年北美國伯理將軍（Mather C. Perry, 1794-1858）將軍率領的「黑船」打開門戶後，德川幕府就積極推動「船堅炮利」政策，開發海軍。肥田在長崎海軍傳習所受過航海、操炮、造船、蒸汽機械學、數學、和其他相關項目的嚴格訓練；後來在荷蘭製造的軍艦「咸臨丸」作過船員，於 1860 年橫渡太平洋。1866 年他參與建造日本的第一艘軍艦。哈亭的 *Anno Domini 2065* 是他在荷蘭留學時出版的。該書除了描寫兩百年後科技發展的想像世界外，另一個吸引肥田之處就是乘坐氣球環遊世界，因為肥田親自參加了日本第一期向外擴張的計劃。

為了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日本急需引進現代科技，遂加速外文書籍的翻譯工作。一方面把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翻譯的以及中國學者翻譯的多種古文書籍譯成日文白話或加「訓點」，最著名的例如《萬國公法》，該書本由傳教士丁韋良（William Martin, 1827-1916）譯自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 1785-1848）《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中文本，於 1865 年傳入日本。另一方面，經過

⁴⁰ 〔日〕沼田次郎，《幕末洋学史》（東京：刀江書院，1951 年）。武田楠雄，《維新と科学》（東京：岩波書店，1972 年）。

一個世紀的蘭學訓練，日本人也直接把西方文本譯成日文。

近藤的「蘭學」老師高松讓庵原在德川幕府設立的譯書局——日文叫「蕃書調所」（成立於 1855 年）工作，是一位官方譯員。這個譯書局除了翻譯外交文件之外，也負責有系統地翻譯外國報紙和雜誌材料，並於 1857 年設立一個附屬學校，訓練學生外文及外國研究，其語言課程除了荷蘭語外尚有英語、德語、法語和俄語，也包括現代科技的訓練課程。高松親自教導近藤，近藤有語言天分，後來窮其一生翻譯了不少西書。近藤於 1866-1868 年翻譯 *Anno Domini 2065*（《新未來記》）時，也應德川幕府政府之請翻譯了一本外科醫術的書，還整理了一本關於海軍炮術的書，可見他在譯哈亭的小說時，是把這本書置於一個官方系統性研究西方科技的脈絡裡。

譯者在本書每一章後都有評語，例如在有一章後如此說：「作者（哈亭）的目的肯定是在勉勵現代讀者多學習，因為所有的發明皆根源於學術。所以此章結尾顯露出培根自己的語氣。誰說小說無用？如果大家體會到培根的這些話的涵義，將會對社會大有裨益。」⁴¹ 近藤引的培根的這段話，大意是說現代的政府都在鼓勵所有人民學習，增長知識，而不是把學術視為政治的特權，學術歸政治特權階級是老一代人的狹隘閉鎖的想法。培根又說，現代的情況不同了，政府官員已經無權決定學術技藝的優劣，而是取決於眾人之心，而判定價值有無。⁴² 這段話可以代表現代學術獨立於政治的思想。對於近藤從事介紹西方學術的工作當然有吸引力。雖然日本當時的新學需要幕府的庇蔭和支持，然而「蘭學」一向是在大城市的私人學校所教授，和中央政府保持相對的獨立。特別是和傳統漢學相較和話，後者以德川幕府主持的「昌平黌」學堂為中心，而且有系統地推廣到全國各地的郡府

⁴¹ 〔荷〕哈亭（Pieter Harting）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ジフスコリデス）（東京：青山，1878 年），卷上，頁 22。以下日譯本皆據此。

⁴² 哈亭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卷上，頁 20。

所辦的「藩校」，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德川幕府，面對外國的侵略，才把「蘭學」歸於江戶中央的政府統籌管理。在哈亭的小說中近藤看到一種新學術的獨立精神，在舊有的制度中剛剛開始實踐。

雖然近藤真琴翻譯《新未來記》的工作是在日本推動跨文化引進西學的背景下進行的，但這個譯本直到 1979 年，他譯完此書十一年之後才出版，譯者的大量注解評語似乎是在出版時加上去的。如將哈亭的小說放在當時日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來看，它和其他翻譯的文本——教科書，科技材料，和技術指南等——大不相同，因為哈亭的文本畢竟是想像出來的故事。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時機總算成熟了。

1860 年代末，有關科學教育的通俗讀物在日本開始大量出版，此時有關西方文明各方面的知識信息迅速傳播到日本讀者，從科技到風俗習慣，從衣服到食物，從地理到歷史，應有盡有。⁴³ 科普教育的抬頭，首先歸功於明治思想領袖福澤諭吉（1835-1901）的大力提倡，他撰著《訓蒙窮理圖解》（1868），此書乃是選譯自英美的各種當代物理、地理、和生物歷史教科書的集錦。這部三卷本極為流行，後來被剛成立的各新式公立學堂採用為教科書。另一套著稱的是譯自英國教育家 Charles Baker（1803-1874）的《繪入智慧の環》（繪入智慧之環）知識叢書（1870-1872）：包括《智環啓蒙塾課初步》（1866），乃是轉譯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譯自 Baker 叢書的一本中文譯本，用的是傳統方式，只把原來漢字旁邊注以日文讀法。而五年後出版的《繪入智慧之環》則用白話日文，並附有大量圖片，這是一種介紹西方知識的嶄新方法，目的在於向廣大讀者群普及新知。到了 1870 年初，科普出版物的數量大增，造成所謂的「窮理熱」現象，而「窮

⁴³ 〔日〕日本科学史学会編，《日本科学技術史大系・通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64），卷 1。〔日〕柳田泉，《明治初期の翻訳文学》（東京：春秋社，1935 年）。

理」指的就是現代科學。

而上條信次後來的譯本《開化進步：後世夢物語》的文體反而較為老式，依照傳統的「漢文訓讀體」，平鋪直敘，也沒有注解，此處不必詳論。相形之下，近藤的譯本更適合日本的一般讀者，因為它是白話體，而且採用了大量的日文俗語，所以近藤的《新未來記》也代表譯者致力於現代日本普通教育的開創成就。他的教育事業後來促成了攻玉社的成立。

哈亭小說最吸引近藤的段落是培根和「幻想女」芳德西帶領故事的主人公參觀圖書館和博物館。在譯者評註中近藤特別舉出三人先到展覽館目睹各種 2065 年的神奇科技，然後去參觀圖書館和博物館。譯者評道：「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為了擴展人民的知識。在此我們終於看到上一章討論的各種文物和工業的本源。如果人民不學習，即便是花多年功夫也不會有成就」，於是近藤引了一句「聖人言」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吾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使得自己的教育觀點更有權威性，當然也稍稍曲解了《論語》的原意。⁴⁴ 總而言之，近藤欣賞哈亭的小說，不僅是內中展示了將來世界進步科技的面貌，而且敘述了一個教育過程，指導讀者如何從科技奇觀回歸到知識的「本源」，也就是說，必須先學習現代科學。《新未來記》的出版，也必然受惠於當時科學普及教育的迅速發展。

由於日本大眾對科學教育的興趣，科幻小說也隨之盛行。⁴⁵ 《新未來記》的出版恰好與凡爾納的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的日譯本《新說八十日間世界一周》（川島忠之助譯）同時，在以後十年間，凡爾納的作品大量翻譯，大受歡迎，大眾對科幻小說的接受也促使近藤出版他十年前的這本譯著。而這本小說中譯本：《環

⁴⁴ 哈亭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卷上，頁 51。

⁴⁵ 〔日〕長山靖生，《日本 SF 精神史：幕末・明治から戦後まで》（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 年）。

遊世界八十天》則遲至二十多年後才出版。

和凡爾納的小說相比，哈亭的小說顯得平實而乏味，因為後者描寫的將來世界是基於十九世紀的實際科技現況而作的邏輯推測，而非用文學的想像加油加醋。書中介紹的標準時間和坐飛船旅行至地球的令一面，乃基於當時關於共同時間和平面空間的科學觀念，而並沒有表現將來未知領域的探險。由於哈亭的 *Anno Domini 2065* 只不過是一種科學知識的推斷，近藤其實也批評了哈亭的科學想像力。小說不是教科書或教材；即使作家自稱小說是一種科學性的呈現，但想出來的畢竟是一種虛構。因此它的虛構性也給予譯者足夠的自主空間和權利來想像另一個將來世界的可能性，乃基於他自己承繼的文化傳統，而非接受一個「普世的」純科學標準。在全書最後的長篇評語中，近藤這樣寫道：「西方人自然不會瞭解亞細亞諸國的情況，我們必須由從古到今的歷史演變中去推測未來。一般來說，你不應該從自己不知道的來思考；如果你不思考，你也無權夢想」。⁴⁶ 近藤把歷史插入哈亭的科學想像之中，正因為這個荷蘭作家不知道亞洲國家從古到今的歷史，所以他不能預測亞洲的未來。「你無法夢想你不知道的東西」，近藤辯道。更大膽的是，譯者由此而提出歐洲文明發展歷史的另一種「認知地圖」：他把日本歷來的皇朝和歐洲歷史上重要的時期放在同一個時間表來審視，歐洲從羅馬帝國的興起到分裂，到哥德人（Goths）和蒙古人的入侵，到十六世紀的君權復辟。近藤認為後者是歐洲近代文明的開始，時當日本永祿（1558-1570）和天正（1573-1593）年間，他寫道：「只不過是從永祿一年到慶應（1865-1868）一年三百零八年間的事，在日本悠長的歷史範疇中來看，這個近代歐洲文明是一段很短的時期」。⁴⁷ 這位日本譯者用了這一種時間表，一方面把歐洲歷史

⁴⁶ 哈亭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卷下，頁 53。

⁴⁷ 哈亭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卷下，頁 53-54。

置於日本本土的時間座標，而另一方面也把哈亭小說中科技發展後舉世通用的時間觀念「相對化」了。

對抗哈亭的想像，近藤真琴刻劃了他自認為必然是亞洲的前途：日本和中國將首先經由互相競爭而文明起來，而其他國家——朝鮮，越南，泰國，和緬甸——將跟隨在後。於是在日本和中國引導下，亞洲文明將會發展，而不致於像印度一樣被英國殖民，至少近藤想像如此。且不論近藤的理想的實際內容，哈亭的小說提供譯者一個基本的自主能力，根據他自己的歷史知識來自由想像日本參與全球「現代性」的亞洲方式，而不僅是依照西方文明的進步過程。近藤在結論時給讀者一個警惕：

我相信此書的作者不可能預測亞洲的情況。然而，歷史的潮流起伏，人類是可以控制的。因此我希望讀者不要把此書作為稗官小說而忽略了。如果忽略，我們結果也會碰上培根的警告：急著接受西方的衣著和居住方式並不代表真正的開明。大家應該為此擔心才是。⁴⁸

我們的日文譯者拒絕哈亭的小說想像可以適用於亞洲，也突出人類決定歷史的主體性。他從書中得到的結論是：浮面的模仿無濟於事，根本不代表現代文明，各國人民應該根據自己的歷史經驗，用他們自己的想像力來設計現代性的遠景。翻譯哈亭的小說，對這位譯者是一件極為嚴肅的工作，就是把日本參與全球現代性所得到的教訓，可以同時超越文化的特殊性和抽象的科學普遍性。所以小說中的培根也被改頭換面，變成了一個現代「理性」的說教者；換言之，近藤把哈亭小說的地位提得更高：他不僅僅把這本小說當成「虛構的敘事」，而是把那種科學想像移植過來，變為日本「未完成的現代性」的理論核心。

⁴⁸ 哈亭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卷下，頁 55-56。

四、結語：比較翻譯文本的「跨文化」教訓

我們從以上一個文本旅行的例子，可以看到「跨文化」研究更複雜的一面：它不僅是一個西方「原文本」旅行到東方後與原有的文化傳統糾纏的問題，而且還牽涉到中日兩國只見的不同傳統和歷史去向，以及文學只見的借鑑和借用。中日學者都往往至顧及到西方名詞的中譯來自日本，而日本譯名又來自中國古文的問題，然而，我們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來，兩國譯者對同一個文本的翻譯和接受大異其趣。哈亭的科學小說在中國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而在日本卻受到「蘭學」高手的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近藤最後關於中日現代化之後的亞洲局勢的結論，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5-1896）後已經應驗，日本海軍果然厲害，把配備不錯的北洋艦隊打得一敗塗地，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早已遙遙欲墜，至此一蹶不振；不到十年，又把帝俄艦隊打垮，日本變成二十世紀亞洲的霸權國家。再次印證了近藤的預測。

然而晚清譯者為什麼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政治層面？為什麼哈亭的小說只有楊德森譯自英文本的譯文，楊德森顯然沒有看過近藤的日譯本，如果楊氏或其他晚清譯者看過，自會發現近藤的評註，不知會作何感想？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近藤譯本中借用了中國通俗小說中的大量說書模式，而楊德森文本中則盡付闕如。最明顯的例子是近藤本每一章的開頭都加上的對聯詩句，如第四章（日文作第四編）：「電氣妙工夜現月光／傳信奇機筐藏歌妓」，真是妙不可言，顯然為了吸引一般讀者，達到普及科學教育的目的，應與中譯者的用心相同，晚清讀者更會接受這種模式。但《夢遊二十一世紀》原載《繡像小說》，和其他翻譯和創作的小說並列，似乎更重寓教於樂，沒有其他嚴肅的用心。誠然，這又牽涉到日本「蘭學」有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早已奠定江戶後期科學研究的基礎，而晚清的「西學」只不過發展了幾十年，

京師譯書局的設立，也顯然受到日本的影響。

從此書的兩種日譯本看來，在日本從德川到明治，文字改革的風潮越來越受重視，所以近藤用的是「俗語」（卷上，譯者例言），而非「漢文」或根據漢文傳統的「漢文訓讀體」；晚清時代的文人尚未完全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楊德森的譯文是典雅的文言，較晚清的小說更像論文，也許他和近藤一樣，感受到原著的小說性其實不強，而是用小說虛構的「假象」來論證一個科學發展的可能性。日文譯者在這方面有很明顯的自覺，因此有足夠「主體性」提出一己的歷史觀。相形之下，中文譯者仍然以儒家傳統為依據，沒有提出一己之見。也許楊德森翻譯此書時還是一個學生，尚未留洋深造。不敢貿然發論。

楊德森和近藤真琴翻譯這本《公元 2065》之時，中日兩國正面對西方文明的霸權。兩位譯者都急切把哈亨對將來科學的臆想移植過來。近藤特別向讀者提出警告：哈亨的想像含有明顯的「歐洲中心」偏見。這本科幻小說展示出科學和文化之間的曖昧疆界，而它的翻譯更提醒我們：知識的傳播從來不是單純的「普世性」現象，科學本身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其傳播過程中的權力關係的中介。

一個多世紀以後，今日世界各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結構關係早已產生巨大的變化，而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已被質疑，特別有鑒於全球變暖等環境危機。就在 2014 年，哈佛和加州理工學院的兩位知名教授，Naomi Oreskes 和 Erik M. Conway，合著出版了一本科幻小說新書——《西方文明的崩潰：一個將來的觀點》（*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⁴⁹ 用一種「回頭看」的方式，從 2093 年的立足點來想像將來，那是一個「反烏托邦」式的世界，由於氣候的轉變而充斥着大自然的災難，對此西方科學家束手

⁴⁹ Naomi Oreskes, Erik M. Conway,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無策。⁵⁰ 這本小說有意思的地方是：把人類的黑暗命運講出來的敘述者——一位將來的「史家」——「活在第二個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Seco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這兩位美國作者顯然以中國大國崛起的例子反過來批判當今西方國家的氣候科學(climate science)的實踐方式，他們認為後者受制於一種「意識形態的固執」和西方本身的文化習成。曾幾何時，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還急於為了改變本國的「過時文化實踐」而競相移植「西方文明」。我們當然也懷疑中國是否能提供一個更好的意識形態或有關氣候科學的文化實踐，然而這本科幻小說也引出另一個啟示：有鑒於當今世界各國權力關係的變遷，一個世紀前楊德森和近藤真琴需要應付的老問題「科學」與「文化」似乎又回來了，我們再次面臨考驗。

也許，重讀哈亭的科幻小說並沒有過時——或者應該更確切的說，不見得是這本十九世紀末的小說，而是它的中文和日文譯本使得我們有更深切的感受。

(責任校對：朱芯儀)

⁵⁰ 兩位作者在卷首介紹寫道：「我們面臨的困境是：作為啟蒙運動的子孫，我們（在西方）在得到大量氣候改變的訊息後沒有及時付諸行動」(the dilemma being addressed is how we — the children of the Enlightenment — failed to act on robust informat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小說中又說：「我們史家的結論是：西方文明已經進入第二個黑暗時代，面對這個悲劇，各強國由於對『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性的固執，而陷於自閉和自我欺騙。而瞭解這個問題的科學家又受制於他們自己的文化實踐之中，對任何要求都定下嚴厲標準——甚至包括危急的威脅本身，也是如此」。(Our historian, they continue, concludes that a second Dark Age had fallen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hich denial and self-deception, rooted in an ideological fixation on 'free' markets, disabled the world's powerful nations in the face of tragedy. Moreover, the scientists who best understood the problem were hamstrung by their own cultural practices, which demanded an excessively stringent standard for accepting claims of any kind — even those involving imminent threats.) Naomi Oreskes, Erik M. Conway,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 pp. IX-X.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梁啟超，〈夏威夷游記〉（舊題〈汗漫錄〉又名〈半九十錄〉），收入《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冊2。

〔清〕梁啟超，《世界末日記》，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冊11。

〔荷〕哈亭（Pieter Harting）著，近藤真琴譯述，《新未來記》（ジフスコリデス），東京：青山，1878年。

〔荷〕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說部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

Harting, Pieter. Alex V W. Bikkers, tr. *Anno Domini 2071*. 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Original, with preface and additional explanatory notes. London: William Tegg, 1871.

二、近人論著

〔日〕日本科學史學會編，《日本科學技術史大系·通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64年，卷1。

〔日〕攻玉社學園編，《近藤真琴伝》，三重：三重県郷土資料刊行會，1987年。

〔日〕武田楠雄，《維新と科学》，東京：岩波書店，1972年。

〔日〕沼田次郎，《幕末洋学史》，東京：刀江書院，1951年。

〔日〕長山靖生，《日本SF精神史：幕末・明治から戦後まで》，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

〔日〕柳田泉，《明治初期の翻訳文学》，東京：春秋社，1935年。

〔英〕卜立德（David Pollard），〈凡爾納、科幻小說及其他〉，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18-150。

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撰委員會，《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896-2005）》，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年，卷上。

張治，《中西因緣：近現代文學視野中的西方「經典」》，上海：上海
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 年。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收
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頁 247-
275。

單德興，《格理弗遊記（學術譯注版）》（*Gulliver's Travels*），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

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名人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 年。

顏健富，〈小說烏托邦——論晚清文學的結構與書寫〉，《漢學研究》
第 29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17-151。

Brace, Susan. *Three Early Modern Utopias: Thomas More: Utopia /*
Francis Bacon: New Atlantis / Henry Neville: The Isle of Pi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co, Umberto. *Serendip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9.

Kern, Stephe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Oreskes, Naomi. Conway, Erik M.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erts, Ada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SFE: 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網站：<http://www.sf->

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遊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

encyclopedia.com/entry/japanta（檢索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

「Roger Bacon」，網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Bacon（檢索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an Old Text :
The Meaning behind *Dreaming about the 21th
Century* 夢遊二十一世紀**

Leo Ou-fan Lee*, Satoru Hashimoto**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l” translation based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a single Dutch science fiction text - AD 2065. It contrasts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ors received and reacted to the text. It contrasts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ors as intellectual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received and reacted to the text. We first do a close reading of the original novel, underscoring its Europea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ntellectual lineage as well as the “Euro-centered” inclinations behind its message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We then proceed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in detail and place them in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in particular the Reform Movement in late Qing China and the “Dutch Learning 蘭學” tradition in Tokugawa-Meiji Japan. Finall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translator’s detailed a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The Sin Wai Kin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ollegiate Assistant Professor, Humanities, Society of Fellows in the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ginal text, which are appended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s, we seek to draw a brief conclusion regarding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Key words: science, utopia, advanced civilization, world harmony,
Dutch studies 蘭學, geopolitics

